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中國古禮研究

鄒昌林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中國古禮研究

鄒 昌 林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中國古禮研究 / 鄒昌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民81

面 ; 公分. --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 27)

ISBN 957-668-061-1(平裝)

1. 禮記 - 批評, 解釋等 2. 禮俗 - 中國

531.27

81004672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中國古禮研究

(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

著 作 者 :	鄒	昌	林
指 導 教 授 :	余	敦	康
發 行 者 :	范	惠	美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地 址 :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 : (02) 3635008

傳 真 : (02) 3635439

郵 政 劃 撥 : 0016084-0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811號

： 第 二 卷 八 十 一 年 九 月 初 版

印 數 : 500本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台幣 240元

ISBN 957-668-061-1



作者簡介

鄒昌林，一九四八年生，原籍湖南。中學畢業於北京景山學校。當過六年知青，四年中學教師。一九八一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八四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八五年至八七年，留研究生院教務處工作，任講師和副處長。八七年秋，考取本院宗教系博士研究生，從師於余敦康先生，九一年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現在社科院宗教所儒教研究室工作，任室副主任。

自序

我把這本寄托著對祖國文化無限深情的著作獻給台灣的讀者和海外同胞。這是我的博士論文，也是一部文化上尋根的作品。它正符合當今之世海內外炎黃子孫文化上認同的需要。反祖歸根，共建未來，這是我們共同的心願。

這也是一部從新的角度審視中國文化的作品，它闡述的是我對中國文化整體上的看法。這是我幾年來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結晶。願它的面世，起到學術交流的應有作用。

相對許多同齡的台灣友人來說，我的學術生涯是短暫的，可以說，剛剛起步。你們是先生，而我只有資格當學生。但若以實際的年齡來說，我卻可能要超過你們，因為時代給我和與同樣經歷的一代人打上了更多的印跡。希望這種對社會的體驗和認識，能填補我在學術上的稚嫩，使這本著作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有著更多的底蘊。

我要感謝我的師長，是他們培養了我嚴肅的治學精神。每當我看到他們那種身居陋室，卻心憂天下的情懷，一絲不苟，決不愧對後人的態度，我就油然而生敬意。使我體會到，學術是一項莊嚴的事業，它需要傾注熱忱，更需要嚴謹的科學態度。故不理解的東西，我是不敢亂寫的。以前幾年掀起的文化熱來講，那種看法紛呈，情緒各異，眼花撩亂，莫衷一是的局面，反映了人們對社會和現實的關注固然是好的，但理論上的混亂，也是可想而知的。以我之魯鈍，當然很難一下子把這些東西鬧清楚，故遲遲

無法做出應有的反映。但現實和傳統，這個永恆的主題，卻是我不能不關心的問題。故立一心願，決心好好研究一下，窮根究底地找一下其中的真正根由。這是我寫作這篇論文的真正目的之一。

我是學歷史出身的，那種窮根究底的興趣，亦使我始終追踪著歷史表象下的真正原因。這種研究方式，最終使我矚目於東西方歷史的差異。但迄今為止的成型理論，都還沒有跳出歐洲中心論的理論框架。無論是所謂的亞細亞道路，還是五種生產方式，都是如此。前者雖然強調東方，特別是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但由於這種道路是低級的道路，是導致社會停滯不前，沒有內在發展動力的道路，所以，它只能臣俯於西方道路的腳下，由歐洲來統治世界，以歐洲為中心來建立世界程序。因此，這種理論並沒有跳出歐洲中心論的框架，正好是歐洲中心論的必要組成部分。所謂五種生產方式，雖然強調的是世界歷史的統一道路，也容易為大多數中國學者的感情所接受。但東方，特別是中國，畢竟落後於歐洲社會整整一個時代，所以，從西方看來，仍有著歐洲優越的感情。何況，這種理論基本是根據歐洲的歷史總結出來的，對東方的膚淺了解和對中國古代社會幾乎一無所知，是創立這一理論時的局限。因此，這種先天的缺陷，決定了這種理論仍脫離不了歐洲中心論的軌道。無論何種歐洲中心論，都是歐洲優越感的基礎，它表現在各個方面，比如哲學、文化、政治制度、社會的價值觀念，等等。但是，隨著東方的崛起，尤其是東亞經濟的發展，這種歐洲優越感也越來越動搖。然而，由於歐洲中心論未打破，以歐洲中心論建立起來的社會價值觀念，仍在世界範圍內占據統治地位。所以，歐洲中心論乃是東方民族，特別

是像中國這種自古獨立感很強的民族，重建現代化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主體精神的重要障礙。正是因此，所以歷史地提出了打破歐洲中心論的要求。很多學者都在有意無意地做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例如，海外新儒家早已提出了中國文化是自我獨立承續的活文化，企圖證明中國文化是可以獨立於歐洲中心之外的文化體系就是如此。諸如此類的做法還不少。所以，有的學者認為，歐洲中心論已經被打破。然而，也正如有的學者批評新儒家所指出的，新儒家由於過多地用主觀熱情代替冷靜的科學的探討，因而，他們「這種心態早已超越了客觀精神和科學研究的町畦，情感的投注變為宗教的虔誠，其主觀性和盲目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們這「一片真誠」，在一片西化的「無情的現實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蒼白無力的道德空想，只能在上一代夢幻破滅的廢墟上又重新編織的另一個美麗的夢。」（《海外新儒家》第 12-13 頁，三聯出版社 1989 年 4 月版）。這種批評是否失當，我們且不論，但它起碼說明了這樣一點，以非常冷靜而嚴肅地建立起來的歐洲中心論的理論體系，也要靠嚴肅冷靜的科學探討來打破。如果至今為止的那種歐洲中心論的理論框架還沒有被打破，而只是根據人們的普遍願望和心態，是不能說，歐洲中心論已經被打破了。欲從根本上打破歐洲中心論，就必須從根本上動搖它的體系。而要做到這一點，又不是一個純理論的問題，而必須以充分的歷史事實為根據，尤其必須從根源上講起，因為這是理論的起點。正是基於這種理解，使我最終矚目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源頭，以求通過這種探索，從根源上清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為我們正確地理解現實和創建未來，提供可以憑借的依據。這是本文寫作的另一真正目的。

在中國文化中，儒學一直是主流。如何認識儒學的本質及其方方面面，這是目前文化研究的熱點。但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臨的雙重任務，使儒學的研究亦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分歧和對立。一方面，是五四以來摧枯拉朽的反封建力量，使儒學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儒家思想成了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的代名詞，是革命的對象。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的劇烈衝突，又不能不使人固守作為中華民族耐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礎，這種要求，又使儒學被神聖化了。這種分歧和對立，至今沒有消除，以至各方情緒都很大。一些負有雙重使命感的知識分子，雖然做出了很大努力，力圖恢復儒學的真正面目，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獨木難支，至今無法改變儒學的兩難局面。例如，什麼是儒學？儒學的本質是什麼？像這樣的基本問題，至今分歧很大，無法取得共識。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除了上述社會原因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爭論的各方，至今還只在流上做功夫，還無人真正系統地深入到中國文化的源頭中去。所以，對儒學的許多根本問題，還無法從根源上找到最終的答案。有時，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例如，對於儒學根本估價的認識，就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儒學的基礎是禮，它維護的是禮制，而禮或禮制是奴隸社會的產物，因而儒學或儒家，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從本質上是維護奴隸制的，因而是起反動作用的。對這種影響廣泛的看法，雖然許多學者不同意，亦做了不少努力和探索，但無法否認禮是儒學的基礎，而又不能證明禮與奴隸社會沒有必然聯繫，因而這種看法，至今還有市場。但筆者從源頭上看問題，卻證明，古禮並非奴隸社會這一特定時代的產物，而是起源於母系氏族社會，中經五帝時代和三王時代兩次整合而層累積淀起來的，以自

然禮儀爲源頭、社會禮儀爲基礎、政治等級禮儀爲主幹的原生文化系統，儒學對這個系統的繼承，並不是對三代（即所謂奴隸社會）一個時代的禮儀制度的繼承，而是對整個古禮系統的繼承。而且，這種繼承，也不是以三代才形成的政治等級禮儀爲基礎的，而是以五帝時代就已產生的社會禮儀爲基礎的。所以，儒學盡管以禮爲基礎，卻和三代的政治等級制度——即所謂奴隸制，並不是一碼事。因而，從源頭上看，把儒學或儒家思想的性質，解釋成是維護奴隸制的，是起反動作用的，顯然是站不住腳的。由此可見，對儒學許多根本問題的理解，比如，「仁」和「仁政」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庸」的思想，「大同」理想，等等，若不從源頭上去把握，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筆者爲了從根源上理解儒學，所以，決心深入到中國文化的源頭中去。這亦是本文寫作的真正目的之一。

傳統和現實，這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人們對現實問題的認識每深化一步，都伴隨著對傳統文化和歷史的更深層的认识。現實和傳統，未來和過去，在學術上就是這樣往復循環地緊密聯繫在一起，不斷引向深入。然而，這種學術的發展，尤其是大發展，又往往是以研究方法的突破爲起點的。在近現代史學研究中，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古史辨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都是以方法上的突破爲先導，而造成了蔚爲壯觀的學派和潮流。因此，爲把學術引向深入，亦應時時注意研究方法的創新。爲了深入到中國文化的源頭去，筆者在寫作此文時，亦在方法上做了一點嘗試。首先，筆者把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運用在《三禮》研究中，借助這種方法及其成果，來破解古禮中所包含的上古社會的各種信息。其次，筆者把結構分析的方法運用在對中國早期文化的整體

研究中，運用這種方法來正確地把握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有機聯繫，並通過這種分析，來正確認識儒學的有關問題。這都是前人用過的方法，只是筆者把所要研究的內容與方法做了有機的結合而已。在本文中，屬於筆者獨有的嘗試，是突破了古史辨以來「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的局限，並反其意而用之，提出了筆者對古禮，實際也就是對古史的新構想。

疑古的方法，是對清代考據之學的發展和創新，是使中國史學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環節，許多近現代史學大師，都是由於這種疑古考據的深厚功力而蜚聲中外的。這種方法的基本點，就是挑毛病，對以往的一切記載都取懷疑的態度，並一層一層地剝析古史中後人摻雜進去的東西，然後用以來確定其真實的年代和真偽。在做了這樣的功夫之後，再來研究其內容的價值。這種研究方法，對於衝破封建史學體系的桎梏，是發揮了極大的革命作用的。它把封建史學體系搞了個七零八落，摧毀力極大。但這種方法，也有它明顯的不足，它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基本考察的是它的負面，即整個古史文化系統，是怎樣由後人一層層地加進內容，有意無意地作偽，而逐漸形成起來的，因而，傳統的古史都是不可信的。而它的正面，即整個古史文化系統，是怎樣一層一層地由文化的積淀，而層累形成的，却沒有涉及。對於負面的考察，只有利於破壞考察的對象。而只有從正面考察，才有利於建設所矚目的目標。疑古的方法，是近現代反封建的產物，它的貢獻是巨大的，不可抹煞。但是，到了當代，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已經不能再停留在破壞封建文化上了。建設現代化的中國文化，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應當有一個大的革新。筆者爲了達到對中國文化尋根索源的目的，對疑古方法反

其意而用之，正面考察形成古史觀的真正原因，即是著眼重建中國歷史文化體系而對古史文化系統提出的新構想。至於這種構想是否正確，筆者願安承教，甘當引玉之磚。

總之，以上就是筆者寫作此文之目的，當然也就是本文的基本特色。然而，此目的涉及的範圍極廣，難度亦相當大。限於個人功力、時間和文字能力，照顧不到而出現的弊漏將不會少。唯希望它的主旨能夠引起海內外同仁的注意，並給予指教，我也就滿足了。若不能達此目的，而變成字紙簍中之物，此誠我最感悲哀者。

壬申年春正月

序於北京陋室

目 錄

自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國爲禮義之邦，禮爲中國文化之標誌	5
第一節 中國文化根於禮	13
第二節 秦漢之際古禮與新禮的交替	21
第三節 《禮記》對於研究古禮的價值和意義	29
第二章 從《禮記》看古禮的起源與整合	43
第一節 古禮是一個完整的表意系統	46
第二節 《禮記》對古禮起源的探索	58
第三節 古禮所反映的古代社會生活	73
第四節 古禮的整合與大同社會	119
第三章 從《禮記》看古禮的結構、功能和價值	147
第一節 古禮的類別和結構	148
第二節 古禮的主要功能及其內在的統一性	158
第三節 古禮的基本功能與中國文明形成的道路	171
第四節 古禮的深層結構和功能	177
第五節 古禮的價值系統	199
第四章 中國文化爲什麼以禮爲基礎	245

前 言

從一定的角度來說，世界文化可以看作兩大單元：一是原生道路的文化單元，一是次生道路的文化單元。所謂原生道路和次生道路，是指相對於世界第一代文明而言。迄今為止的世界性的文化，都是在世界第一代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凡是沿著世界第一代文明奠定的方向，獨立或基本獨立向前發展的文化，可以看作原生道路的文化。凡是第一代文明受到外部的壓力和打擊，發生中斷或斷裂之後再發展起來的文化，可以看作次生和再生道路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儘管西亞、北非、南非及歐洲地中海沿岸曾是世界第一代文明的搖籃，但都由於外部的打擊而遭毀滅，以後重新發展起來的文化，已屬次生和再生的文化，故可劃為一個大單元。而中國文化，則由於高山、大洋和沙漠的阻隔，在漢代以前，一直獨處一隅，基本不與外界發生關係。漢代以後，雖有佛教的東傳，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一定影響，然而在已經奠定了雄厚基礎的中華文化面前，最後也只好俯首稱臣，被中國固有的文化所改造，而融入中國文化的發展模式之中。直到近代以前，可以說，中國文化仍處於幾乎完全獨立發展的狀態。所以，中國文化完全是沿著第一代文明奠定的方向，獨立向前發展的，是一種原生道路的文化。正是因此，中國文化號稱世界的奇蹟。故它與長期受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亞各國文化一起，構成了世界文化的另一個大單元。

中國文化雖是一種原生道路的文化，但它對於世界文明的貢

獻和影響，卻並不限於本土和周圍地區。從很早的時候起，它就通過古老的絲綢之路，開始把中國的物質文明向外傳播。唐宋間暢通起來的東南海上通道，加速了這種傳播的速度，尤其是蒙古帝國的龐大版圖，開啟了中西物質文化大交通的時代。隨中國物質文明大規模的外傳，尤其是四大發明的西傳，終於在異鄉開花結果，揭開了世界近代文明的序幕，導致了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隨之，追逐財富的巨大動力，最終使近代西方文明的航船，駛進了這個東方神秘帝國的轄區。隨著基督教的擴張，西方耶穌會士的來華，世界文化兩大單元全面交通的時代才開始。中國古代燦爛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至此才完全地展現在西方面前。它無論從哪一方面，與西方文化相比，都顯示著獨特的光彩。因之，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國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古代文化站在一起，毫無遜色，都是最高水準的文化。故萊布尼茨稱：「大陸兩極端的二國，歐洲及遠東海岸的中國」是「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文明」。^❶但是，中國文化顯示出來的完全獨立的品格和特異性質，又使歐洲社會感到非常的驚奇。例如，中國文化發展的非宗教傾向和理性早啟的特性，竟使歐洲啟蒙思想家讚嘆無已，並給他們反對歐洲的封建宗教和神學提供了另一種文化的榜樣和範例。然而，中國文化和民族的特異性質，又使他們感到那樣的陌生。故萊氏又稱中國民族和歐洲民族為「最有教養和最隔膜的二民族。」^❷既然如此，那麼，作為古代最高水準的、長期影響周圍各國發展的、且以其技術發明對世界進入近現代社會起過推動作用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它的功能和價值取向，是循著怎樣的道路發展起來的呢？它具有著怎樣的結構特徵和價值功能系統呢？幾個世紀以來，這一直是具有著無窮魅力而

吸引著中外理論界和學術界的問題。何況，作為第一代文明僅存至今的孑遺，作為幾乎有古代科技約一半左右發明，卻未能自行走向近現代科學的社會來說，中國文化更是一個巨大的謎。揭開中國文化生成之謎，對於歷史科學來說，對於中國文化的未來和世界文化的未來來說，都將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正是因此，近年來，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傾向，就自然而然地日益深入到尋根索源的的道路上。本文在這裏，也欲作一點嘗試，冀希一孔之得，以就教於先知聞達。

註 釋

- ①②《萊布尼茨文集》第 78 頁。轉引自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第 225 頁。

第一章

中國為禮義之邦， 禮為中國文化之標誌

探討中國文化生成之謎，首先涉及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是什麼？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必須首先提出來。

關於這個問題，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才突出出來的。若不與其他文化，特別是與歐洲文化相比較，我們往往自己意識不到。故留意於此者，多為近現代學者。如梁啟超說：

人類全體文化，從初發育之日起截至西歷十五六世紀以前，我國所產者，視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無遜色。雖然，我國文化發展之途徑，與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趨。故如希伯來人印度人之超現世的熱烈宗教觀念我無有也；如希臘人日耳曼人之暝想的形而上學，我雖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歐洲之純客觀的科學，我益微不足道。然則中國在人類文化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於此方面之各種問題，以今語道之，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包含之諸問題也。蓋無論何時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嘗不歸結於此點。坐是之故，